

是一個單純的古典符號，家族衰敗的陰影、個人童年的心理創傷，甚至包括她戰時的體驗與現代上海的先鋒文化因素諸如頹廢、虛無等確有共鳴之處，否認這一點，就難以

看到張古典精神的現代意義。顯然，《十五講》應該敢於面對而不是迴避上述問題，因為這樣做有助於揭示張愛玲古典文學精神的複雜內涵。

一個書法文化世家的生命基因

● 王田葵



曾昭薰：《湖南歷代文化世家·道州何氏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在中國文化傳承的線索中，各個歷史時期都曾有一批數代相傳、各具特色的文化世家。在這些家族

中，文化精英輩出，文化成果不斷，對推動中華文化發展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和貢獻。曾昭薰的《湖南歷代文化世家·道州何氏卷》（以下簡稱《道州何氏》，引用只註頁碼）一書，通過作者多年對湖南永州人文歷史的考察和研究，從外內兩個側面考察了道州何氏書法文化世家賴以崛起、取得成就和影響的「健康基因」。該書結語寫道：「道州何氏家族是我國中晚清時期一個著名的文化世家。它的崛起突兀而又悠遠，它的成就厚重而又獨特，它的影響深廣而又持久。它是湖湘文化肌體上的一個細胞，卻又承載着這一文化全部的健康基因。」（頁279）

大凡皇權制時代士大夫文化世家的生命傳承，必然受到外內雙重生命基因的宰制：向外求索仕途功名，並代代經營出耕讀、入仕傳家基因；向內追求審美情感本體，以之作為人生安慰、寄託、歸宿和方向。這種精神基因恰恰是書法藝術創新的動力。

《道州何氏》一書通過作者多年對湖南永州人文歷史的考察和研究，從外內兩個側面考察了道州何氏書法文化世家賴以崛起、取得成就和影響的「健康基因」。

《道州何氏》將耕讀、入仕傳家視為何氏家族崛起的決定性基因。與耕讀、入仕傳家基因緊密相關的「健康基因」是清廉正直的官德官風，這種官德官風轉化為家族成員恪守不變的家風，並一直延續下來。

《道州何氏》一書將耕讀、入仕傳家視為何氏家族崛起的決定性基因。道州何氏家族第一代遠祖何念三，自南宋理宗嘉熙年間從山東益都一路逃難，最後在道州城東門外定居。他吸取因不識字被人蒙騙的教訓，臨終前留下遺言：今後無論家境如何，都要送兒孫讀書、識字（頁10）。從此，子孫一面勤耕，一面苦讀，「一個詩書繼世、耕讀傳家的望族，正在這片沃土中悄悄萌生」（頁11）。

經過幾代人的文化積累，到第八代傳人何鐸中舉、何鍾中進士，自此之後便是「明經茂才，代不乏人」。從第八代到第十九代，何氏家族「共有進士4名，舉人6名，優貢3名，食餼廩生7名，秀才13名。其中有5人留有詩文著述6部」（頁13）。到第二十代傳人何凌漢以「三鼎甲」探花及第，成為「九掌文衡，五權冢宰，四派經筵直講」的一品大吏（頁47），並以書法聞名海內外。第二十一代傳人何紹基以進士及第，並自創「何體」（蠅書），開一代書藝新風，成為清代成就最高的書法藝術家之一，從而將何氏書法文化世家推向了極盛。

與耕讀、入仕傳家基因緊密相關的「健康基因」是清廉正直的官德官風。何氏家族第一代入仕經國濟民的何鍾，便以清正廉潔聞名當時：「何鍾尤以清廉、正直留名史冊。就清廉而言，一是『奉命敕葬商文敏公夫人，比還，公私饋遺一無所受』；二是『卒於官，囊橐蕭然』，以至於需要在別人的資助（『賻助』）下才能辦完喪事」；何鍾的兒子何思，也是「慈愛廉明兩著，循迹致政，歸惟圖書數篋而已」（頁12）。

這種官德官風形成之後，便轉化為家族成員恪守不變的家風，並一直延續下來，到何凌漢居官時，已經傳承了12代350餘年，這不能不說是家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引以為傲的事。

何凌漢「生平孝友純篤，居恆莊敬刻勵，以忠孝儉樸為訓，故後人皆糲食布衣，出入不得騎馬」（頁46）；「在金錢上，他持守甚嚴，從不越分。中晚清時代，錢能通神，貪賄成風，幾乎到了無官不貪，清白難覓的地步。但何凌漢始終堅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從不越規犯分。他不但不假公濟私、貪贓枉法，而且堅拒收禮。逢年過節，生日喜慶，官場應酬難以杜絕，但他給家人嚴格規定，外面送來的禮物，除了花卉和水果，其餘一律拒收。這一規矩，一直至兒輩、孫輩成人，還始終堅守不渝。」（頁47-48）他身為兩朝重臣，但生活上高潔自好，不隨流俗，始終堅持糲食布衣、鹽菜佐餐之習，教育兒孫為使民無菜色，必須使官「不忘菜根」（頁47）。

在任人上，何凌漢堅持「以根底器識為先」，從不以個人好惡定取捨，更不以權徇私。他的兒子何紹基「少負才名」，然仕途遲滯，先後參考11次，前10次計20年「榜發未中」（頁49），但何凌漢始終不允許兒子走旁門左道入仕。何紹基督學四川期間，仗義執言，敢於越權理案，縱然同眾多貪官發生正面衝突也在所不惜，終因屢陳時弊而被罷官撤職。這同何凌漢的作風是一脈相承的。

何氏世家清廉自守，憂國憫民的官德官風，構成了這一書法文化

世家的內在精神氣質和代代傳承的文化生命的「健康基因」。

耕讀、入仕傳家基因決定了何氏家族的累代興旺和持續發展，但最終決定這個家族在中國文化史上地位的，則是他們生命本體中的精神基因。此生命基因生長出一代代詩書文各有建樹的傑出人物。

何紹基既然在仕途沒有立足盡才之處，只好轉向詩書文的創作，在此「有志期百世」（頁151）。他說：「學詩要學古大家，只是借為入手，到得獨出手眼時，須當與古人並驅。」（頁241）他甚至立下狂語，「若生在老杜前，老杜還當學我」，內心的自信與滿足溢於言表。他的詩謂：「文章恐負經時願，詩酒能平學道心。」又認為行文得「承先啟後繫絕續，賞奇析疑何差池」（頁239）。

追求詩書文合一，意味着創作者「內外兼修」，把詩書文放在一起去訓練、去體悟，使形式與內容同步俱進。在《道州何氏》中，曾昭薰不是就書法論書法，而是始終貫穿何紹基先學做人，然後為詩、為書、為文來論述。中國書法是一種士大夫人文學識的積澱與人格品性修養的結晶。

何氏家族多名成員，是中晚清時期知名詩人，除十九代之前的六部詩文著作之外，從何凌漢到其曾孫何維樸，一門四代先後誕生七大詩書名家，又有五部詩文集傳世。在中國詩歌史上，何氏家族特別是何紹基，在發展宋儒詩學、推進傳統詩歌理論方面，皆有建樹。

何紹基曾是中晚清「宋詩派」的積極倡導者和重要骨幹，他把宋詩的三大特徵，即拓展題材、增強理

趣、吸收唐宋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詩等全面加以繼承，並作了重要發展。自乾隆、嘉慶年間，許多人倡導學習宋詩。嗣後，程恩澤、祁俊藻等人以朝廷重臣、學界宿耆的身份競相作「宋儒詩」，並倡導詩歌與學問、考據相結合，「尚宋之風」已成氣候。書中指出：「何紹基作為程、祁的門人，接受了程、祁的詩學見解，全面推進，多方拓展，將詩歌與學問、考據結合的觀點付諸實踐，又在實踐中總結這方面經驗並加以發展，形成了系統的理論，奠定了近代『宋詩派』的最初格局。」（頁99）

何紹基關於詩歌的「本源論」、「功能論」和「創作論」在當時產生過廣泛影響。他提出詩的本源來自外部的物質世界和社會生活，「萬物是薪心是火」，外界事物與心靈發生碰撞，即成詩歌；在詩的功能上，他繼承「興、觀、群、怨」的傳統，強調「溫柔敦厚」的性理派詩教功能論；在創作方面提出「不薄唐詩愛宋詩，轉益多師是吾師」，強調「不依傍前人」，「不將就俗目」，「不偏離大本源」。他以自己的創作倡導「明理養性」的詩歌創作主張。何紹基詩歌三論對糾正明末以來的膚廓、纖仄的詩風有一定積極意義（頁234-44）。

當然，書法文化是何氏家族世代積累的最重要精神財富。「何體」之所以既有獨特個性，又有意幽韻遠的文化內涵，在於何紹基始終認為「書法不是簡單的書寫技巧，而是與人們對宇宙人生的基本觀念、審美追求聯結在一起的」（頁175）。在離蜀前，他對家人說：「書雖一

耕讀、入仕傳家基因決定了何氏家族的累代興旺和持續發展，但最終決定這個家族在中國文化史上地位的，則是他們生命本體中的精神基因，由此生長出一代代詩書文各有建樹的傑出人物。書法文化是何氏家族世代積累的最重要精神財富。

能將楷、行、草、隸、篆諸體融為一爐、相互貫通並在諸體上推陳出新、確立其書法地位，正是「何體」的獨特價值和獨特地位所在。這就決定了何氏家族在中國文化世家和文化史上的地位。

藝，與性道通，固有大根巨在。」曾昭薰解釋說：

這就是說，書法不是一種簡單的書寫技巧，而是與人們對宇宙人生的基本觀念、審美追求聯結在一起的，「魯公書似其方正忠烈」、「坡公書似其豪宕間遠」，沒有人格精神上的高韻深致，堅質浩氣，就不會有高妙超絕的書法，因此，要學好書法必須「豎起脊梁，立定腳跟」，方寸貴直養。（頁175）

此評十分允當。

何氏家族究竟積累了哪些書法創作經驗呢？其要點有三：一是「規範習練路徑，即從顏入，經歐李，再到漢魏諸碑；從楷書，到行草，再到篆隸八分」；二是「確定審美標準。何凌漢依據自己長期的書學經驗，將書法優劣的審美標準，借用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意十二法》的術語，概括為『橫平豎直』四字……這一科學的經驗總結，在何凌漢手裏，完成了一次飛躍：他把顏真卿的筆法規則，上升為一種審美標準，使之成為一種書學文化觀念，書法結字規則，書法運筆方法，這就大大拓展了它的內涵」；三是何紹基將「橫平豎直」的概念再進一步「上升為漢字書法的書律」，「用它來充實『篆分遺意』的內涵，使碑學觀念更加理論化，又更便於實踐操作」（頁283-84）。有了這種科學而深厚的經驗作基礎，再經何紹基的努力實踐，便創立了中國書法史上獨一無二的「何體」。

之所以說「何體」在中國書法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首先是因為其筆

法的獨一無二，那就是「回腕懸書」。書中指出，「『回腕懸書』執筆法是傳統『運腕』方法的一種發展和昇華」，「這種名曰『回腕』實為運肘的執筆方法並非何紹基首創，但因他運用這種方法執著、嫺熟而且卓有成效而定為一格。聯繫他的書學觀念、書學成就，回腕懸書作為諸多執筆法的一種，應該稱得上是書法史上的一種創新。」（頁297）更為重要的當然還不是筆法的創新，而是這種創新所帶來的效果——「迥厚精古新楷書」、「險變奇絕行草風」、「融古匯今興漢隸」、「廣涉鐘鼎留名篆」等各種書體上的創新，才是「何體」特色和成就的真正體現（頁193、199、205、212）。

在中國書法史上，能在一種書體上推陳出新並確立其書法地位者大有人在，而能將楷、行、草、隸、篆諸體融為一爐、相互貫通並在諸體上推陳出新、確立其書法地位者則是鳳毛麟角，這正是「何體」的獨特價值和獨特地位所在。有了這種獨特價值和獨特地位，就決定了何氏家族在中國文化世家和文化史上的地位。

何紹基是清代書壇作品遺存最多、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書家之一。晚清以降，習「何體」者甚眾，且蔚然成風。李瑞清、鄭孝胥、譚延闓、齊白石、舒同、沙孟海、潘綏等書畫大家，無不受其影響。「何體」書法在海外亦流傳甚廣，在日本、韓國、越南以及東南亞都頗有盛名。日本多個城市至今還有專門研究「何體」書法的組織和團體。

《道州何氏》還成功地將家族成員的政治生涯與書法藝術衍生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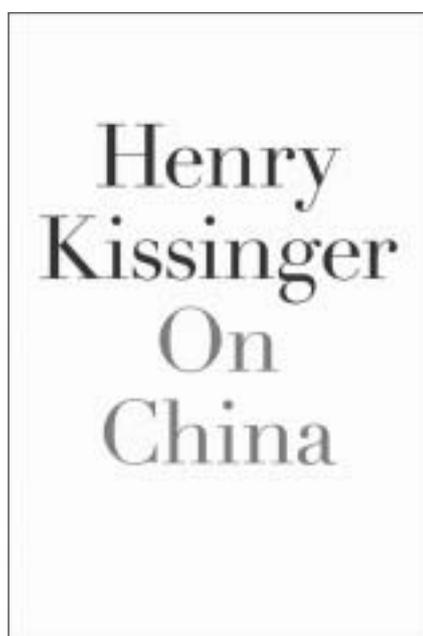
的文化生態環境作了多方面的評介，包括：家族成員的仕途成長與文化的傳承薰陶；地域文化的濡染涵養與特定時代國家體制腐朽、諸多領域蘊含重大變革；何紹基因政治權力的失落而轉向遠離現實的文化藝術領域等。作者通過爬梳傳統史料、地方志、家族實錄、文集、筆記資料，研讀了何紹基三百多篇文章、書信、手稿和兩千多首詩歌，成功地實現了時間縱向的家族史與空間橫向的主要家族成員活動的有機交織。

在何氏家族眾多人物中，《道州何氏》一書着重評析何凌漢以官風書品奠其基、何紹基以創造「何體」書法藝術而昌其盛，主次分明，顯現出曾昭薰的治史態度和對關節點的「把定」功夫。然此書涉及何氏家族眾多成員，有些成員如何紹祺、何慶涵等也頗有影響，因資料缺失而難免有所疏漏。但總體上看，此書較全面地展示了道州何氏書法文化世家的發展歷史與精神風貌，對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化世家現象提供了飽滿而有深度的借鑒。

在何氏家族眾多人物中，《道州何氏》一書着重評析何凌漢以官風書品奠其基、何紹基以創造「何體」書法藝術而昌其盛，主次分明，顯現出曾昭薰的治史態度和對關節點的「把定」功夫。

從中國人的角度、根據親身經歷 理解中國

● 梁 志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2011年5月，一本有關中國問題的專著在美英兩國同時面市，並受到西方世界和中國的極大關注，那便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的《論中國》(*On China*，引用只註頁碼)。

牛津大學專攻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的米特 (Rana Mitter) 教授評價道：這是一本「非同尋常、極具價值」的著作，「文筆優美生動、內容